

魏玛共和国史

上卷

〔瑞士〕埃里希·艾克 著

43

商务印书馆

魏玛共和国史
(上卷)
——从帝制崩溃到兴登堡当选
(1918—1925年)

[瑞士] 埃里希·艾克 著

高年生 高荣生 译

陆世澄 校

商务印书馆

1994年·北京

034617

798

Erich Eyck
GESCHICHTE DER WEIMARER REPUBLIK
Erster Band

Vom Zusammenbruch des Kaisertums
bis zur Wahl Hindenburgs 1918—1925

根据苏黎世欧根·伦奇出版社1973年版翻译

WEIMÄ GÖNGHÉGUÓ SHĪ

魏玛共和国史

(上卷)

——从帝制崩溃到兴登堡当选(1918—1925年)

[瑞士]埃里希·艾克 著

高钟生、高荣生 译

韩世澄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093-4/K·193

1994年6月第1版

开本 860×1168 1/32

199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81千

印数 710册

印张 11 7/8

定 价：10.80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埃里希·艾克原籍德国，曾在弗赖堡大学和柏林大学攻读法律和历史，毕业后从事法律和新闻工作，担任过民主党领导人，并先后任过夏洛滕堡区议会和柏林市议会的议员。在纳粹统治时期，他被驱逐出德国，定居瑞士，此后从事英国史和德国史的研究。在英国史方面，他发表的主要著作有：《格莱斯顿》（苏黎世，1938）和《皮特父亲和福克福父子》（苏黎世，1948）。关于德国史方面，他先是研究从1848年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德国史，发表的研究成果有：《俾斯麦的生平和著作》（三卷本，苏黎世，1941—1944）和《威廉二世及其流亡》（苏黎世，1948）。接着他研究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史，其研究的主要成果就是这本《魏玛共和国史》（上、下两卷，苏黎世，1956年）。中译本上卷根据此书1973年第5版译出，下卷根据此书1972年第4版译出。

本书论述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实行议会民主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历史，即从1918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魏玛共和国建立到1933年希特勒法西斯上台、魏玛共和国解体这一时期德国的历史。作者根据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详细和深入地描述了这一时期德国在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等方面发生的重大事件，并评述了艾伯特、拉特瑙、施特雷泽曼、兴登堡、泽克特、格勒纳等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因此，这部书出版后获得了西方作家的好评。有的说：论述魏玛共和国的作品已有很多，但是艾克的这部书将长久地被视作“关于这个时期历史的最好著作”（瑞士卢塞恩《祖国报》）；有的说：明确、认真、生动的描述是历史著作的重要支柱，“本

书远远超出一般的水平”(维也纳《现代化文献》);有的说:“由于他对事件的全面认识,由于他的追求真实,也由于他的美好的文笔,这部书成了所有人——不论他是赞成还是反对共和国——的一面镜子”(巴登-巴登《德意志评论》)。

作者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主张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反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因此,他对德帝国主义挑动世界大战持批判态度,对希特勒纳粹党的法西斯主义予以谴责;而对魏玛共和国的解体深表惋惜,作者的意图也在于想从魏玛共和国的存亡中吸取民主制的教训。但是,由于作者资产阶级立场的限制,有些论述在我们看来是不恰当的,例如对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德国共产党持反对态度,往往错误地把共产党和纳粹党相提并论。总的说来,本书由于资料丰富,叙述详尽,对我国广大读者和史学工作者来说,是了解和研究德国现代史一个重要时期——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历史的重要参考读物。论述魏玛共和国史的像本书那样的专著,在我国还是第一部。本书的翻译出版,将有利于我国对德国和世界现代史的进一步了解和研究。

本书上卷由高年生、高荣生翻译,陆世澄校订;下卷由王步涛、钱秀文翻译(前言和注释由陆世澄翻译),宋钟璜校订。本书蒙齐世荣教授推荐,并由陆世澄编辑加工,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1990年6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君主政体的崩溃	3
第二章 从革命到国民议会的召开	48
第三章 魏玛宪法	65
第四章 凡尔赛和约	81
第五章 从和约至卡普暴动	131
第六章 内部削弱与外来威胁	164
第七章 拉特瑙遇害与维尔特下台	199
第八章 鲁尔被占领和分离主义	231
第九章 道威斯报告与伦敦会议	308
第十章 艾伯特去世与兴登堡当选	328
德国历届政府情况(1919—1925)	345
参考书目	348
注释	349
人名索引	361

前 言

我在关于俾斯麦和威廉二世的几本书中论述了从 1848 年革命至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德国政治史之后产生了通过魏玛共和国时期继续研究德国政治史的想法。但魏玛共和国的令人震惊的悲惨结局给它的整个历史投上令人伤感的阴影，回首往事的历史学家要有克制力才能坚持这项工作。如果他还参加过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即使所起作用甚微，如果共和国的崩溃对他意味着失去自己的祖国，那么他在深入探讨魏玛共和国的命运时就不能不老是感到“旧创伤的不可名状的痛苦感觉”。但是，两个考虑消除了我的疑虑。知道和理解不久前的往事，对理解和解决德国及其从前的敌国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必不可少的。再者我认为，亲身经历这个时期并且认识或至少见过一大部分有关的政治家的人——例如我曾是讲师黑尔费里希博士的一年级学生，作为见习生在李斯特的刑法讲习班上结识了拉德布鲁赫，作为青年律师与鲁道夫·布赖特沙伊德共同组织过自由党人的集会，作为柏林市议员激怒过威廉·皮克——比只根据档案和书报追述历史的后代历史学家也许能更生动地描绘那个时期的历史画面。

这种牵连当然必然使历史学家只能从特定的立场去观察和叙述事件，即使他极力想要“展示历史的本来面目”。但我认为这并不会有太大妨害，只要历史学家不想隐瞒自己的立场。我相信，读者任何时候都不会怀疑本书作者持有支持共和国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立场。这并非由于共和教条主义——我在英国君主制度下心情很舒畅——而是因为按照历史的发展共和政体成为德国必然

的不可避免的政体。无须指出，在研究史料之后并由于在时间和空间上隔开一段距离，今天我对许多事情的看法不同于我们身历其境的时候。

本书引用的铅印资料，只要看来对核对原文有必要，我都注明出处。通过同曾在魏玛共和国积极活动的人的交谈，我得以补充材料的来源。特别珍贵的是前国防部长奥托·格斯勒博士和前财政部国务秘书汉斯·舍费尔提供的情况，在此谨向他们二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埃里希·艾克

1953年12月于伦敦

第一章 君主政体的崩溃

魏玛共和国的历史始于德意志帝国的崩溃，而德意志帝国的崩溃始于1917年7月12日皇帝被迫解除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的职务。

自从德国军队的胜利进军1914年9月在马恩河畔受阻以后，首相的地位和任务就月复一月地变得艰难起来。贝特曼—霍尔维格在战争爆发时也曾希望战争不会持久，只要进行几次强有力的打击便可结束战争。这个希望化为泡影后，他比别人更快地认识到延长战争会使德国面临多大的危险。这不仅是因为他对实际情况有更好的了解，而且也由于他个人的气质所致。他决不会由于军事上的胜利而对这种危险视而不见。即使那些胜利光辉夺目，却从未带来最终的定局。不久以后，他也比别人更清醒地认识到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弱点。早在1915年3月，他就在给皇帝顾问团首脑冯·瓦伦丁尼的一封密信中写道：“25年来浮夸作风毒化了我们民族的心灵，以至如果禁止他们自吹自擂，他们很可能会变得胆怯起来。”¹由于他持有这种怀疑态度，那些自以为德国人民和德国军队的巨大成就和努力必然会使德国取得辉煌胜利的人都不喜欢他。要是人们知道，他内心怀疑德国对欧洲遭受这场灾难是否毫无责任，思想斗争是多么激烈，这种反感可能会变本加厉。人们确实特别强烈地谴责他在1914年8月4日就入侵比利时一事所作的讲话是不可原谅的。那些认为德国在这场大搏斗中应当在领土上有明显收获是理所当然的人，恰恰把目光投向比利时。这些人的调门越来越高，而政府反对公开讨论“战争目的”的呼声却

愈来愈微弱,愈来愈不起作用。

贝特曼反对公开讨论战争目的,因为他认识到这种讨论一定会在德国人民内部引起严重的、甚至不可调和的对立。即使煤铁工业巨头们认为隆维和布里的矿床是不可缺少的,可它对战壕里的普通人,对盼望丈夫或儿子归来的女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贝特曼最关心的是全民族的团结一致。他感到自豪的是,他在战争开始时成功地建立了全民族的一致,就连社会民主党也参加了民族战线并赞成战争拨款。他知道,该党之所以能持这种态度,是因为他们像绝大多数德国人一样当时深信战争是防御性的。一旦战争变成征服战争,他们就不可能再采取这种态度了。尽管头脑简单的人相信,在国家大权独揽的战争时期,这并没有什么关系,但贝特曼认识到,在各民族的战争中道义力量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很清楚,一个在上次选举中获得四百万张选票,拥有数百万作战军人的政党即使在战时也不是可以忽略的因素。他忧心忡忡地看到该党领袖在自己党内遇到愈来愈多的反对,最后导致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分立。他也明白,一场向每一个人都提出异乎寻常要求的战争必然会产生民主化的作用,不管人们欢迎还是反对。

德国的陆军和海军将领们对这一切持完全不同的看法,是很自然的。他们是抱着德国武力战无不胜的信念成长起来的,在过去的三次战争即1864年、1866年和1870年的战争中德国武力曾证明自己无往不胜、坚不可摧。他们虽然按照传统观念和规定“不问政治”,但这并不等于他们没有政治见解。这是无法用法律规定和清规戒律加以排除的。帝国陆军和帝国海军军官团“忠于皇帝”,是理所当然的。但这一点被人们以特殊的方式作了解释。社会民主党人完全被排斥在军官团之外,对此人们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该党主张建立共和政体。但并非只有社会主义者被排斥在军官团之外。归根结底,只有保守党人才被认为是忠于皇帝的。天主教军

官一般虽然认为自己是中央党人，但这还可以被接受；西德地区工商业者家庭出身的民族自由主义者至少可望得到容忍。但进步党人则在这个界线之外。无论是预备役军官或现役军官都是如此。汉堡律师卡尔·佩特森曾是最有声望的学生团体的成员，他的家族中有人担任过汉堡市长，他本人后来也担任过汉堡市长。尽管如此，佩特森曾两次被叫到当地军队指挥官面前，要他交代在他家中留宿过弗里德里希·瑙曼* 一事。另一位汉堡市长有一次向皇帝介绍他的女婿、律师和预备役军官赛姆勒博士时提到他是国会议员，皇帝就问他属于哪个政党。他答道：“民族自由党。”皇帝说：“唔，这还凑合！”² 施威特费格上校在国会调查委员会作证时说，德国军官在政治上属于右派，此话一点不错。

战争期间这种片面性当然不可能完全保持下去。战争需要大量军官，使和平时期的限制不得不有所放宽。德军投入战争的 33000 名现役军官中，大多数营连指挥官在开战最初几个月中阵亡。³ 即使没有这些伤亡，对军官的需要也只能满足一小部分。1918 年 3 月攻势开始时，在所有战场上共有军官 176000 余人。这当然是不顾旧的惯例，把每一个根据其教育程度和表现看来适合担任军官的人都召集在一起才达到的。甚至对犹太人也不再严格排斥。但是传统势力和旧的偏见仍如此强大，以致 1917 年底年冯·马肯森军团的一道军令还不得不以责备的口吻谈到候补军官的调查表仍然包括“候补者家庭成员的政治观点”这一问题。⁴ 但是就军官团总体立场在政治上起决定作用而言，即使是在战争年代中

* 弗里德里希·瑙曼(1860—1919)是德国新教神学家、政论家、热情爱国的自由主义战士，在其著作《民主与帝制》(1900)及期刊《援助》和《时代》中想把议会制与一个受民众欢迎的君主制以及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创建过短命的民族社会主义同盟(1896—1903)，1907—1912 年和 1913—1918 年任国会议员，他批评威廉二世皇帝，但他的爱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反映在他的影响很大的著作《中欧》(1915年)中；此书要求德国承担起对巨大的中欧帝国的领导。他在 1919 年逝世前，是民主党创建者之一和魏玛国民议会议员。——英译本

被吸收的大量持不同观点的青年军官也没有改变军官团的这种总体立场。因为代表军官团发表意见而且经常很响亮明确地发表意见的都是将军们和其他高级军官，他们自然绝大多数是服现役的“旧军人”，大多数仍然坚持右派观点。

此外，持右派观点的还有那些想利用战争达到征服和并吞目的之人。主张并吞的人主要是——除了少数例外——保守党人以及至少一部分民族自由党人。在中央党和进步人民党等中派政党中，除了坚信防御战的人，还有许多人心目中的战争目的则受军事形势好坏的影响。社会民主党人全部坚持防御战口号，主要分歧¹⁷在于以什么手段达到这一目的。由此可见，其领导人持右派观点的军官团接受右派的兼并主义倾向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倾向又为军事上的考虑所增强。将军们认为，为了在未来的战争中更好地守卫德国边界，必须进一步向东西两侧扩张领土。其政治含义即：比利时仍须处在“德国牢固控制下”，俄国须割让大片波兰土地。

如果德意志帝国像西方议会制国家那样牢固地建立政治领导凌驾于军事领导之上的体制，陆海军将领们的这种倾向对战争的政治指导作用就会无足轻重。乔治·克列孟梭尖锐地说过：“战争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能把它交给将军们去干。”要是一位德国首相即使只是有类似的想法，就会很快叫自己下台。军人占有这种优势，其根源在于德意志帝国完全产生于普鲁士军事国家。俾斯麦诚然也能成功地对付将军们，但这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具有巨大威力、必要时甚至变得粗暴的出类拔萃和千载难逢的人物，没有一个民族可以期望在一个世纪中能不止一次地出现这样的人。而且即使是他例如在尼科尔斯堡也不得不为政治家优先于军人而进行拼死的斗争。尽管如此，1871年他不是在和并吞梅斯问题上违心地向宁可听从军事顾问意见并得到普遍同意的国王作了让步吗？在以后几年中，俾斯麦不是也依靠与军事顾问团首脑冯·

阿尔贝迪尔的联盟来掌权的吗？从此以后，不仅是军人的权力而且军人的威信也越来越增长。

自从最高统帅部由两位声望空前的将军领导以后，这种平衡必然向不利于政治领导的方向转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第一任总参谋长冯·毛奇因未获任何军事成就而无法对抗政治领导。他的继任者冯·法金汉将军尊重首相的权限。但是，当他犯了发动凡尔登攻势，遭到伤亡惨重的失败这一严重错误之后，正是首相冯·贝特曼-霍尔维格坚持解除他的职务，由唯一的那两位曾赢得不朽军事荣誉因而获得大多数德国人民绝对信任的军事领导人来接替他。这两人就是陆军元帅冯·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将军。 18

不论任何时代和任何民族，胜利的统帅都受到本国人民尊敬和爱戴，这是不言而喻的。无数德国人曾对敌人的进攻感到忧心忡忡，听到统帅获胜的消息时感到欣慰，不会忘记他带来的这一令人振奋的时刻。谁会感到奇怪，在进行艰苦斗争的德国人民中，每个人或者说几乎每个人当时都说：“兴登堡会成功！”如果让军事领导人去决定那些其素养和地位不能胜任的事情，这种感情就会是危险的。但是在德国，人们总是喜欢无视这些考虑。在所有的固定餐桌上和许多编辑部里，人们老是重复老战士布吕歇尔关于笔毁坏了剑所赢得的东西这一句话。头脑简单的人比较容易理解胜利之剑这种明确的语言，而要他们理解笔把要求和反要求、让步和反让步的结果慢慢地归纳出来这样一句受一切考虑包括非军事考虑支配的话就困难得多。而头脑简单的人总是占多数。此外，民众舆论把德国卷入这场战争的责任归咎于德国外交，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事实真相，几乎无人知道怎样能做得更好一些。大肆发展海军的政策多么破坏外交活动的自由，这是这种政策的提倡者有意视而不见的，而他们在右派中又是最活跃最嚣张的。 19

根据德国宪法，皇帝集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于一身。他不仅

是君主，而且也是“最高军事统帅”。正是这一概念自从普鲁士国王在60年代的宪法争执中战胜普鲁士议会以后越来越无限地扩大了。在这方面，皇帝通过其日益摆脱议会任何控制的军事和海军顾问团成为绝对的统治者。1861年，特韦斯滕*还能称军事顾问团首脑埃德温·冯·曼陀菲尔将军为“在危险位置上的危险人物”，虽然他因此而受到那位将军持枪对待。⁵50年后，人们对于这一发展听天由命，沉着冷静。

皇帝集可以想到的大权于一身，使德国军事领导具有自己的特点，这是不会使人感到惊异的。威廉二世在战前曾千百次大声宣称他是整个德国的唯一主宰，不仅使德国而且也使全世界均已对此习以为常。在所有这些数不清的讲话中一再地回响着“朕，朕，朕”的声音。“朕率领你们向美好时代迈进。”他一再提到弗里德里希大王是他的榜样并且在评价自己时与他相提并论。但是，当要用实例来检验这一点的时候，就令人感到羞耻地表明在所有这些大话和狂妄姿态后面没有多少东西。面对世界历史上的重大抉择时刻向他提出的要求，他又是多么无能为力。甚至与威廉一世为他树立的榜样相比，他也差得很远。孙子在智能和思想敏捷方面确实胜过祖父，但是在意志、坚强决心、神经坚强、实事求是，总之在性格方面远远比不上祖父。威廉一世尽管有种种局限，却是一个真正的国王，更为明智和伟大的人物也都向他鞠躬。威廉二世只是起了命运赋予他的作用，他的全部讲话和自我表演只有一种效果，即连他最忠实的部下有时也不把陛下的话当真。将军们知道他不是统帅，大臣们知道他不是政治家。尽管他有足够的智能，在向他陈述的针锋相对的意见中常能作出正确的决定。

* 卡尔·特韦斯滕是一位不出名的市议员。他于1861年春写了一本题为《什么还能挽救我们》的小册子。他在书中谴责普鲁士军事内阁及曼陀菲尔将军本人企图统治平民生活和政治。曼陀菲尔随即表示愤慨并要求特韦斯滕收回他的意见，否则就进行一次决斗。特韦斯滕选择了后者，曼陀菲尔射穿了他的手臂。——英译本

可是，一旦这一决定遭到某个意志坚强的人坚决反对，即使此人已肆无忌惮地超出宪法规定的职权范围，他就表现软弱而不能坚持。与威廉一世相反，他不明白，如果君主迫使他的每一个顾问都尊重这个范围，君主的权力和影响就会有多么大的增长。这样一来，在应当是权力中心的地方就产生了真空。

在决定进行无限制潜艇战时就已表明，这种职权混乱状态是多么危险。海军国务秘书冯·蒂尔皮茨海军上将有意地反抗帝国首相，把这个引起争执的金苹果投掷到德国人民中间。蒂尔皮茨背着首相于1914年11月21日接受美国记者卡尔·冯·维冈特的采访，在这次谈话中宣称潜艇战是“迫使英国屈服”的必要手段。⁶他明知贝特曼和皇帝都反对这种手段，因此故意让这篇访问记在美国发表而不让其上司帝国首相知道此事。贝特曼最后还是能成功地对付这位抗命的海军上将。1915年3月15日，蒂尔皮茨被解职。首相帮助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进入了最高统帅部（1916年8月29日），但不久以后首相就发现他给自己设置了对手，他们更加不尊重他的职权，而且比他更有权势。1916年底，首相就不得不抱怨“这些天才的人一再地给合作制造”困难，他们孜孜不倦地谋求使“整个国家生活军事化”。⁷ 21

无限制潜艇战的倡议其实并非由将军们而是由国会中的一个政党提出的。1916年10月2日，中央党议会党团通过一项决议，表示预先赞成宣布进行无限制潜艇战，如果最高统帅部赞同潜艇战的话。⁸这个决议虽然在形式上并未表示反对宪法规定的首相职权，实质上却是中央党想把真正的决定权交给最高统帅部。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这鼓舞了鲁登道夫，削弱了已不再能依仗国会多数的首相的地位。

贝特曼和国务秘书卡尔·黑尔费里希博士竭力反对进行肆无忌惮的潜艇战冒险，因为他们毫不怀疑这会导致美国宣战。虽然

海军领导自告奋勇在美国能参战前就通过潜艇战迫使英国媾和，但大臣们不相信海军的估计，黑尔费里希逐点加以驳斥。⁹ 德国驻华盛顿大使伯恩斯特多夫伯爵强烈警告首相不要与美国和威尔逊总统发生冲突。德国的盟国奥匈帝国也反对。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外交大臣捷尔宁伯爵也没有因为德国海军司令冯·霍尔岑道夫海军上将声称“他担保会成功”而改变看法。¹⁰

首相的主张起初也能得到皇帝的支持。可是1916年12月，
22 先是鲁登道夫，后是兴登堡向外交部和帝国首相坚决要求尽快宣布进行无限制潜艇战。这位陆军元帅在说明提出这一要求的理由时提到而且在以后也反复指出军队的士气，如果不满足这一要求，军队的战斗精神就会受到影响。¹¹ 贝特曼-霍尔维格在12月23日的电报中向他指出：“无限制潜艇战既然也针对中立国船只，就会直接影响我们与中立国的关系，因此是一种外交政策行动，我须单独对之负责，这是宪法规定的责任，不可转让。”兴登堡粗暴地回答说：“我遗憾地收到阁下的电报……为了维护最高统帅部的立场，我不得不声明，阁下作为首相虽然单独负责，但我也将理所当然地继续竭尽全力并以充分的责任感使战争胜利结局，为此主张采取我认为正确的军事措施。”¹²

这就是说，军事领导正式向政治领导宣战并且获得了胜利。1917年1月9日上午首相抵达普莱斯皇帝大本营时，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指出的，决定“事实上已经作出”¹³。换句话说，在陆海军将领们的联合进攻面前，威廉二世退让了。他又一次变卦了。1月9日他下令“于2月1日全力以赴地开始无限制潜艇战”。灾祸不可遏制了。美国向德国宣战。用贝特曼自己后来所说的话来说，潜艇战对于德国犹如从前雅典远征西西里岛*。¹⁴

贝特曼-霍尔维格此刻犯了他政治生涯中最严重的错误：他没

*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远征西西里，遭惨败。——译者

有辞职,而是继续留任。他为此辩护说,他的职责是不去破坏一项已无法更改的决定。如他所写的那样,他不想放弃他在某些人民阶层中还享有的“信任”。他还可以有理由地辩解说到处都找不到合适的继任人,后来的发展表明也是如此。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改变这一原则,即一位政治家如果在关键时刻执行一项他认为是错误的政策,就无异于掐断自己的脖子:“任何与其本身一致的独立性格都是合理的;只有自相矛盾才是不合理的。”这位负责的政治家过去竭力避免与美国破裂,现在突然转到必然会直接导致这种破裂的政策,难怪一位不偏不倚的观察家只能得出这一结论:要末是德国首相要末是德国制度动摇了,或许两者皆是。新政策——不论是否明智——应由一位新人来执行。贝特曼唯有辞职才能捍卫只有首相才对政治决定负责的原则。

只是在半年以后,贝特曼就不得不为其实际上放弃这一原则付出了辞职的代价。不过这次辞职是德国政体混乱的结果,这种混乱很能说明该政体是多么不完善和不合时宜。

不过贝特曼留任的那几个月在一个方面并非全无价值。几个月来,他明白也必须向广大群众作出政治让步,人民群众已经作出许多牺牲并且随着战争的继续还将被要求作出更多的牺牲。这种必要性在普鲁士选举法方面最为明显,该选举法自从两代人以来就带有不折不扣的富豪统治性质,这和时代的要求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也许贝特曼更加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他在内心不能推卸责任,先前有机会时并未努力一抓到底促使其解决。诚然他在这个问题上遭到的反对不能低估。在普鲁士邦议会中占有几乎牢不可破的实力地位的保守派战时仍顽固坚持贵族地主立场,他们的势力很大的领袖冯·海德布兰德在1916年还能公然在众议院声称:“不谈一些美中不足之处,我们普鲁士众议院的形状是几乎理想地符合我邦需要的形状”。¹⁵ 贝特曼于1917年3月14日在这个众